

“中国故事”的叙述策略与传播认同机制*

——基于彼得·海斯勒非虚构小说“中国三部曲”的考察

■ 王小英 明 蔚

【内容摘要】 彼得·海斯勒“中国三部曲”在中外皆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其获得广泛认同的深层机制值得探析。从读者评论出发,究其深层原因可知,其故事文本中有很多引发认同的机制设置:首先,作为外国人,其题材选取和视角呈现上的组合,恰好对国内外不同的读者构成了一种认知差,使得讲述的共通话题“既熟悉又陌生”;其次,叙述方式上采取的“第一人称叙述”普通人生活所带来的沉浸式体验,能够更加贴近中国日常生活;最后,作者对讲述事件探究式的评价建立在同理心的基础之上,由此故事得以冲破文化的藩篱最终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这些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提供了另一种路径。

【关键词】 形象传播;非虚构小说;中国故事;彼得·海斯勒;认同机制

DOI:10.19997/j.cnki.xdcb.2021.11.012

一、引言:考察国外非虚构文学中讲述的中国故事

传播学上的雅各布森模式(见图1)将传播视为由6个要素构成的交流行为,除了发送者/接受者这一对传播主体之外,与文本相关的还有:语境、信息、接触、符码这4个要素。研究信息如何在相对封闭的语法语义场内通过符码产生意义的,即为表意研究。“讲好中国故事”中对叙述策略和说服技巧的研究,大部分即属于表意研究,研究故事讲什么(message/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contact/in which channel),以及如何组织编码(code)。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考虑到某种特定语境(context)中如何去讲,接受者的文化思维特征,主张有针对性地讲,讲的时候要有国际视野。但是,这些研究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假设——讲述者(addresser)是中国人或组织,然后根据锚定的点,也即有好的传播效果,去研究传播主体如何组织关于中国的故事文本,以便取得好的传播效果。并且这些研究关注较多的是新闻文体、纪录片、电视剧等,较少注意到语境脉络中其他文类体裁对中国故事的传播,由此造成了外宣性质的研究居多,功利性较强,忽视了非广播电视电影领域内的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主要的传播障碍就在于:因对中国了解的贫乏导致国外受众对中国认知的困难;因‘中国威胁论’的蛊惑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导致国外受众对中国媒体有一种警惕甚至排斥心理,因文化差异导致国外受众与中国媒体在期待视野上的不同或错位”^①。中国媒体讲中国故事,故事讲述者的官方性质,让其作为故事文本的发出者说服的意图过于明显,且因为意识形态和文化鸿沟的存在,在接受者那里就会形成一种接受“前见”,这样一来,对话交流

的基础就会十分薄弱——信任关系的脆弱、共享事物匮乏、认知习性相异,传播也就难以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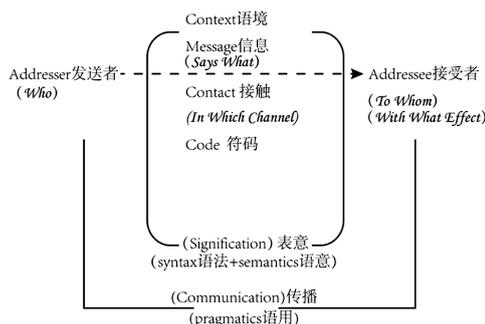


图1 雅各布森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的对应^②

既然传播不同于宣传,是双向的交流和沟通,那么传播者和接受者就会处于角色的不断转换之中,由此对话才能达成。所以,放在传播领域中的“讲中国故事”就一定是一个多元传播主体的事,中外媒体和个人均可充当传播主体,重要的是要沟通对话。因此,调转思路,锚定好的传播效果这一点,考虑外国人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借镜他者,从他者处借力,同样成为探索“讲好中国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

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除新闻纪录片外,非虚构文学也是一种重要方式。并且,“文学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话语表意实践,它通过故事、人物、情节、场景和历史的塑造,对特定文化和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个体和群体具有深刻的认同建构功能”^③。文学实践不仅是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得以建构的重要手段,也是理解外部世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文化产业合作共赢模式及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ZDA044)的研究成果。

和反省建构自身的重要渠道。虽然文学以虚构想象为主,但非虚构文学的兴起,建立了文学与现实的强联结,也使其成为承载中国故事的绝佳文学文体——既是真实的又是文学的。再加上非虚构文学在国外的兴盛,“当下欧洲文学界或者说社会上最受欢迎的文体是非虚构文学作品,如果要给这些文体排序的话,第一是非虚构文学,第二是诗歌,第三才是小说”^④。这种文体在建构中国国际形象方面的力量不容小觑。

非虚构文学的核心之一是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非虚构小说介于新闻报道和虚构文学之间,其所明确瞄准的靶子有二:一是客观古板的新闻写作,二是传统形式的虚构小说。非虚构小说一改那种枯燥无聊的新闻写作方式——以见证、经历及进入对象内心的方式,来弥补新闻写作中文学性和真实性的不足,将诱人的现实事件作为小说的写作题材。“非虚构写作在美国相当成熟,这种介于文学和社会调查之间的写作方式,追求在呈现客观和扎实的细节的同时,将现实讲述得更加生动、好看”^⑤。就中国故事而言,以非虚构小说的方式呈现,从体裁上就规定了其是对中国的纪实。故而,国外的非虚构小说与新闻报道在塑造中国形象上的地位是相等的,都属写实之类,且前者传播效果更佳。目前,国外非虚构文学在美国最为繁盛,由于有《纽约客》等杂志的支撑,产生了大量的职业非虚构作家。2000年后,出现了大量讲述中国故事的非虚构小说,如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的中国三部曲《江城》(River Town)、《甲骨文》(Oracle Bones)、《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 欧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时代》(Age of Ambition) 梅英东(Michael Meyer)的《消失的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等。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是中国题材非虚构小说引起国际兴趣的根本原因。海斯勒的《江城》于1998年完稿后,多家出版社以美国人不会有兴趣阅读关于中国的书籍而拒稿,直到2001年该书才以廉价稿酬出版,

并成为外国人来中国前必备的畅销书。在Goodreads这一全球最大的在线读书社区由读者投票产生的CHINA Expat Books排行榜上,海斯勒的《江城》《寻路中国》和《甲骨文》分别位列一、三、四名。在译成中文的国外非虚构作品中,海斯勒“中国三部曲”的豆瓣评分也都超过了9.0分,在同类书籍中排名第一,其传播效果与影响可见一斑。这能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哪些有益参考,值得深思。这里主要考察的问题有二:国内外读者对三部曲的关注点及异同在哪里?这些中国故事为何能够得到有力的国际传播?

二、同中有异的读者接受:基于对中国三部曲评论的关键词分析

海斯勒,中文名“何伟”,英美文学硕士,曾于1996—1998、1999—2007、2019—2021年在中国旅居。英文版三部曲分别于2001、2006和2010年首次出版,其后数次重印,前两本还分别于2006和2007年进行了再版,长期位居美国亚马逊中国图书畅销榜,《江城》还一度位列中国旅行类书籍之首。繁体中文版的三部曲也都先后各有两个译本,《江城》有2006和2012版,《甲骨文》有2007和2011版,《寻路中国》有2011和2013版。简体中文版的《江城》和《寻路中国》也于2012和201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并且至2017年4月已经分别印刷了16次和18次,印数也都到了247200册。

海斯勒的中国书写,不仅在图书市场的表现成绩喜人,也赢得了极好的口碑。《江城》获得过“Kiriyaama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曾是《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寻路中国》简体中文版领跑了新浪的2011年十大好书榜榜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书在国内外大型的图书评论社区Goodreads(满分为5分)和豆瓣读书(满分为10分)上都有大量的评论,并且赢得了很高的评分,具体如表1。

表1 “中国三部曲”的评价情况(截至2019年10月27日)

图书(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网站评分	评价数量	星级占比				
			5星	4星	3星	2星	1星
<i>River Town</i> , Harper Colins, 2006	4.21/goodreads 网站	10503	43%	39%	13%	2%	0%
<i>Oracle Bones</i> , Harper Colins, 2006	4.17/goodreads 网站	5953	40%	41%	15%	2%	0%
<i>Country Driving</i> , Harper Colins, 2010	4.21/goodreads 网站	6402	42%	40%	14%	2%	0%
《江城》(简体中文),李雪顺译,上海译文,2012	9.0/豆瓣读书	31361	58.6%	35.1%	5.9%	0.3%	0.1%
《消失中的江城》(繁体中文),吴美真译,八旗文化,2012	9.2/豆瓣读书	528	61.4%	32.8%	5.7%	0.2%	0.0%
《甲骨文》(繁体中文),卢秋莹译,久周出版社,2007	9.1/豆瓣读书	2137	62.5%	31%	6%	0.3%	0.2%
《寻路中国》(简体中文),李雪顺译,上海译文,2011	9.0/豆瓣读书	37214	56.9%	35.9%	6.6%	0.4%	0.2%
《寻路中国》(繁体中文),赖芳译,八旗文化,2011	9.2/豆瓣读书	657	62.1%	33%	4.4%	0.3%	0.2%

英文版三部曲在Goodreads上的评价数量,已经超越了很多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如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评分虽然有4.19分,但评价数量只有

308。英国非虚构作家扶霞·邓洛普(Fuchsia Dunlop)的《鱼翅与花椒》(*Shark's Fin and Sichuan Pepper*)的评分和评价数量也分别只有4.02和3037。并且,三部曲的

中译本在豆瓣读书上的评价数量和评分 都超越了 Goodreads 上的对应指数。《江城》《寻路中国》^⑥ 简体中文版的评价数量已达到了 30000+。Goodreads 和豆瓣读书上评价的星级占比,海斯勒的中国三部曲所获得的五星和四星占比合计均在 80% 以上。其中,豆瓣读书上五星占比超过了 56%,一星占比也都在 0.2% 之下。根据数据显示,简体中译本比繁体中译本的关注量高很多,中国读者对海斯勒的非虚构中国书写兴趣很大。而这一数据 与之类似的题材,梁鸿 2010 年版的《中国在梁庄》相同时间的评价数量和评分只有 3514 和 8.0。

由于 Goodreads 上的评论是英文评论,豆瓣上是中文评论,因此笔者通过爬虫软件 Python 分别在 Goodreads 和豆瓣读书上抓取中英文五星好评,将收集到的用户评论采用词频分析法进行分词和高频词汇的提取。在经过词频软件 Nvivo 进行分词和高频词统计处理后,得到中文词条 1001 条,英文词条 985 条。由于样本数量大,根据词频热点的分布规律,本研究最终选取出现频次在 50 次以上的有效高频词汇进行整理呈现,结果如表 2 所示。

英文高频词中,China 和 History 高居榜首,数量上远超其他高频词。Chinese 虽然屈居第三,但考虑到其与 China 的邻近关系,因此,可以归为一类。这些词中名词最多,其中专有名词有 China, Hessler, Fuling, Chi-

nese, English, 分别指向特定的国家、人、区域和语言。普通名词中 history, life, peace, country, time, culture 和 story 都是抽象名词。形容词有 modern, first, English, interesting, 其中有些既可以做名词又可以做动词,唯一的动词为 read, 表明读者和小说的接触方式。进一步聚焦 Goodreads 上的热门评论,发现在对中国形象的认识上,大部分读者都认可中国的丰富性、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复杂性。《江城》排名靠前的一则热评直接提出:与中国相比,美国的问题也很多,“这里的普通公民并不比他的中国同行更有能力实现变革。我们只是有参与的错觉。至少中国人比较现实”^⑦。在《甲骨文》里,读者“看到了经济蓬勃发展的现代中国、中国农村、被遗忘的偏远小城和国家的历史”^⑧。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负面印象,譬如《寻路中国》的首条热评提到“有一点可以肯定。从现在开始,我将永远害怕中国的出租车司机。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能力很强。”^⑨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爆发后,不仅三本书的评分均有所提升,而且出现了对中国新的解读,《寻路中国》排名第二的热评认为该书是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写了个人选择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发挥的作用^⑩,随后一位读者的回应中更是将其总结为“中国经济内部充满活力,是以创业精神为基础的”^⑪。从读者评论来看,三部曲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总体上是比较积极、正面的。

表 2 Goodreads 和豆瓣读书上读者评论高频词词表(截至 2019 年 10 月 27 日)

英文高频词词条及词频			中文高频词词条及词频		
China(441)	History(335)	Chinese(162)	中国(1466)	江城(359)	涪陵(280)
Read(144)	People(106)	Years(99)	生活(255)	美国(178)	情节(173)
Hessler(92)	Town(86)	Country(79)	外国人(146)	观察(105)	城市(100)
Life(78)	River(71)	English(71)	真实(97)	地方(94)	变化(92)
Peace(65)	Modern(64)	First(62)	社会(91)	记录(91)	描述(84)
Time(57)	Culture(52)	Corps(51)	发展(76)	视角(64)	长城(59)
Stories(51)	Fuling(50)	Interestin(50)	历史(53)	乡村(52)	工厂(50)

中文高频词中,专有名词同样位居第一,只是增加了“江城”“美国”两词,“涪陵”的排位大幅提前。普通名词中“外国人”位居前列,“城市”“地方”“社会”“长城”“历史”“乡村”和“工厂”等指向空间的名词居多,指向时间的名词“历史”排名靠后。动词有“观察”“变化”“记录”“描述”“发展”,表明注意到了作者的写作方式。

排名第一的词语,中英文非常一致,均是“中国”/“China”,也就是说中国题材是读者们关注最多的。尤其在英语评论中,“Chinese”这个关键词的排名达到了第三,“people”排到了第五,表明英语读者更看重其表现中国、汉语和中国人的内容。这点从海斯勒的创作经历也可以看出来,中国题材成就了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回首过去,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中国的时候,我的书恰好出版了。”^⑫

《江城》2001 年出版,其时中国成功申奥、加入 WTO、举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国不断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与中国的受关注度成正比。

在中文评论中,“美国”“外国人”这些表示异国和外来者的词语出现频率非常高,而在英文评论中则没有与之对应的高频词,与之相关的只有作者 Hessler。可见中国读者对作者的美国身份具有较高的知觉,但英文读者关注更多的是“海斯勒”这个人,并没有意识到是一个美国人或者外来者在写中国,也即对小说是“从异质文化视角来看”这点认识不是很明确。换言之,英文读者并没有将海斯勒当作美国人的代表,而是注意到了其更具体的身份。同理,“视角”也是中文评论里出现而在英文评论里没有出现的关键词。Peace、Corps 这两个高频关键词在英文评论中经常组合在一起出现,Peace Corps 是海斯勒首次来到中国的志愿者

组织名称,对这个组织名称的关注体现了英文读者比较了解海斯勒的背景,而中文读者对此缺乏认识。中文关键词“涪陵”“江城”位居前列,而相应的英文关键词“Fuling”“river”“town”出现频率和排序则要低得多。这种现象说明了涪陵这个中国小城在不同读者群体中的印象并不相同,对中文读者的印象比对英文读者的印象更深刻些。

中英文读者的高度认同,以及高频词的不同,是与海斯勒中国小说本身的特点关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由于小说本身的写作技巧和丰富内涵,导致不同的读者群体对其进行取舍各异的“片面化”解读,从而获取了对外来文化和本身文化的对照性理解和比较,最终达成了经由小说而进行的沟通和交流。那么,海斯勒小说文本究竟有什么特点会引发这种阅读效果呢?

三、认同接受的基础:海斯勒中国故事的叙事机制

讲述中国故事的传播实践很多,然而在国内均能获得认同的实例却并不多见。要么能在国际上获得较高的认同,却被国人视为“编造”“想象”“抹黑”甚至“妖魔化”,要么能在国内获得较好的接受效果,在国际上却波澜不惊。从文学实践的历史脉络来看,18世纪的西方人看中国,大多将其视为“乌托邦”,如伏尔泰等人作品中有着“明君贤臣”的中国。19世纪的西方人看到的中国,愚昧狂妄,自以为是。外国文学中关于中国的“集体想象物”往往和真实的中国相距甚远。因此,考察海斯勒中国故事讲述中的意义传播所需的认同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 着眼共通话题:锚定有认知差的言述社群

言述宇宙(universe of discourse)是皮尔斯提出的一个概念,李斯卡(James Jacob Liszka)进一步指出:“言述宇宙是发送者与解释者为了交流发生所必须共享的那种东西,因此它被称作‘言述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可能更为恰当。为了使交流得以发生,作为发送者的符号则必须成为解释者所共有感知的一部分;反过来说也就是,交流要求从一个公共社群(common community)中获得一种感觉性。而这就使得发送者与解释者的可交换原则(exchangeability)得以存在。”^⑬简言之,发送者的观念和了解到的碎片应该连接到接受者的全景中,接受者能为发送者充当发送者。非虚构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是需要连接到英语读者的世界中的。海斯勒作为美国人与英语世界读者的连接优势在这一点上显而易见,与汉语世界读者的连接则是其卓越之处,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其对共通话题的选择上。中国学生的英文课堂教学、三峡大坝、长城等都是较为常见的一些共通话题,这些话题构成了言述社群形成的基础。

有了共通话题使言述社群具备了对话的条件,但意义活动之发生还需要认知差(cognition gap)充当基本动力。认知差指意识主体所感知到的与对象之间的

认知落差状态,“对任何问题,主体意识感觉到自身处于相对的认识低位或认识高位,这种认知的落差是意义运动的先决条件”^⑭。海斯勒的非虚构小说很巧妙地同时为中国读者和西方读者提供了认知差,尽管这种认知差有所不同。

英文读者感到有趣的点之一是海斯勒融入当地生活的经历。海斯勒讲述自己的经历时,特意提及了中国学生是如何学习莎士比亚的,并且对之赞许颇多。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这为中国人的生活与西方文学世界提供了关联点,属于共通话题上的认知差,“当被交流符号能够把发送者与解释者‘焊接’(welded)在一起时,交流行为就发生了”^⑮。海斯勒受过系统教育,熟谙西方世界,由此在寻找认知差上占优势。当海斯勒用美国人熟悉的视野,将共通话题放置在其中国经历中去讲述时,故事内容层面的“陌生化”就会出现,构成了读者阅读时的认知差,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相吻合。海斯勒的前经验视野是英美读者所熟知的,但在选取素材上的焊接点则是其独创之处。当陌生世界通过海斯勒熟悉的前经验视野过滤,就呈现出“陌生”与“熟悉”交织的效果。

与西方读者相反,构成中国读者认知差的正是作者的西方文化视野。英文版的《江城》附了三张中国地图,分别标出长江水系上的四川涪陵、涪陵城区和四川在中国的位置。简体中文版《江城》则去掉了这三张图。显然,这种取舍是基于不同读者作出的,涪陵于中国读者而言不缺认知差。《江城》将相互陌生的涪陵人和海斯勒置于同一空间,双方互视,彼此充满好奇。这一点在译者李雪顺那里得到了确证,“《江城》英文版出版之后,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涪陵人自然被激起了强烈的阅读欲望,谁都想一探究竟,何伟这么一个美国人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地方的。地方上的领导们把这事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层层转交到了我的手上,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中文译稿”^⑯。这种跨视角的审视恰好就是文学写作所注重的“陌生化”,“陌生化则不断破坏人们的常备反应,使人们从迟钝麻木中惊醒过来,重新调整心理定势,以一种新奇的眼光去感受对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⑰。当这种陌生化是对中国人自己生活世界的打量时,其文学魅力就会大增。

(二) 第一人称叙述“我”浸入式体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第一人称叙述是目前国内外非虚构小说较普遍使用的叙述方式,如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以及包括海斯勒、史明智(Rob Schmitz)、梅英东在内的美国和平队成员有关中国的非虚构小说,采用的都是这种叙述方式。第一人称叙述,也叫同故事叙述,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人物。叙述学家兰瑟(Susan Lanser)按照叙述者在故事中卷入程度的高低,将其分成了五种类型:主人公、复合主人公、小角色、见证式人物和非卷入式的目击证人。^⑱第一人称叙述并不必然带来浸入感,但当写

“我”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时,就构成了浸入式体验,此时“我”与“我”所讲的中国人共同成为小说的复合主人公。并且,“我”是要为所展示的事情提供人格担保的真实作者。

海斯勒的中国故事在取材上有个特点,即偏爱写普通人的生活,而非进行宏大的历史叙事。第一人称叙述难以进行宏大的历史叙述、全景叙述,海斯勒完美地避开了这一短板。第一人称叙述的长处,在于便于随时发表作者个人的感受、体验和评价,将读者与叙述者捆绑。读者在阅读时,跟着作者“我”去看中国的山川社会,了解作者内心的感受和对人事的看法,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因为叙述者“我”在事件发生地,读者“你”和“我”在一起,所以“我们”都在事件发生地。这是在叙述视角设置上,将读者与叙述者“我”相捆绑,制造阅读时的在场感。

“我”充当叙述者,也利于张扬“我”的主体性,让读者了解到“我”的所思所感,并进入到“我”的内心世界,这种写法属于内聚焦。进一步来说,“我”和“中国人”的距离越近、交往越多,浸入度越高,对中国人生活的理解也就越加深刻。三部曲都有相当部分写了作者和中国人结交并建立深度友谊的过程,《江城》是面馆老板一家和自己的学生,《寻路中国》是三岔的一个农民家庭。从读者评分来看,可以发现评分与作者在故事讲述中的浸入度成正比,《江城》最高,《甲骨文》最低。而在热门评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海斯勒的肯定性评价中“engaging”“true life experience”“finding his feet in China”“fit into the daily life there”等字眼经常出现,而其出现的原因则来自于其中所讲的事并不全是“他们”的事,也是“我们”的事。来自外团体的“我”,掌握了汉语,逐渐理解了中国人那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对语言、传统习俗和习惯等原先这些含混不明的事情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敞开、倾听和参与构成了理解文化差异的一把钥匙。

(三) 探究式发表意见:评论中国人和事时的同理心

海斯勒的作品能达到如此高的认同也与其在小说中发表的见解评价有关。皮尔斯认为,有五种确立意见或信念的方式,即固执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先验的方法、公共意见的方法,以及调查或探究的方法。^⑩固执的方法和权威的方法分别依赖习俗和强权,公共意见是权威对公众意见热情引导的结果。先验的方式是如笛卡尔、康德等传统的哲学家所采用的方式,是通过理性去建立一套普遍的、超越任何社群的基础信念。探究的方法将意见和信念建立在持续的调查上,以归纳、试推和演绎为主导原则,承认信念错误的可能性,允许诸种信念的并存。与其他方式相比,持续的探究可以确立真正的信念,是建立在敞开和倾听基础上的文化理解方式。

海斯勒在讲述中国故事时,经常采用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通过仔细的观察、归纳,有

时甚至是寻找材料来支撑自己在故事讲述中发表的意见。这也为他赢得了英语世界的诸多好评,如在 Goodreads 上获赞最多的五星评价中就明确提及,作者没有猎奇式地看中国,而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外来者身份,即便是当人们仅仅因为他是个西方人就对他拳脚相加时,他也以疏离和反省的眼光去讲述。^⑪实际上,读者评论相当关注海斯勒讲述中国故事时的态度,对作者的赞同经常用“empathy”“sense for the human side of the story”“heart-renting insights”^⑫等词语来肯定;而一些读者对其小说不满也因其同情不足而引发:“Most of the time the book doesn't evoke much sympathy (other than pity, possibly) for the people, and it certainly reinforces a lot of negative stereotypes about the Chinese”^⑬。探究出的意见或许并非正确,但通过探究的方式去真诚地理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却为其赢得了更多的认同或理解。

在小说中,身为叙述者的作者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学识、态度和修养在叙述中呈现出来。海斯勒的优点在于判断非常谨慎,很少着意渲染某种情绪。他的见解通常是经过大量的事实观察和资料查询而来,尽管这些意见也有不妥之处,却不会显得太主观和生硬。正因如此,中文读者才更能够接受和理解。在全球互联的时代,国与国之界限不断被跨越,讲述他国故事时,误解不可避免,但只要不断地去尝试理解就能不断减少误读。而尖酸刻薄地讲述他国故事,不仅会影响他国读者对其作品的接受,同样也会影响到本国读者对其作品的认同,如同样是讲述中国故事,美国作家 J. Maarten Troost 的 *Lost on Planet China* (2008) 就因为刻薄肤浅而在 Goodreads 上评价不高。当海斯勒和周围的中国人在面对一件事态度、行动不同时,他会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避免西方社会文化习俗对个人的规定,尽力去探索、总结不同中国人背后的行为逻辑,努力将之放在更大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予以解释,如当讲到农民魏子淇的儿子因住院与护士发生冲突时,作出宽容式的理解。这是将人放在社会大环境中纵深理解,基于同理心而作出的判断。

外国人的中国小说能否赢得中国人的认同,往往取决于作者是否认真地采用了探究的方式,是否具有同理心。如果作者能用移情来理解和评判中国故事是如何发生的,中国人怎么理解和看待自己,那么这种态度就会比较容易超越文化的隔阂,获得广泛的认同,正如豆瓣上关于《江城》的评论中排名第一、获得了 250 个“有用”标签的热门评论所言“这就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交往,他们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也许不同,本质上对感情、对文学、对社会责任的感受却没什么区别。”^⑭人类固然有文化的差异,但在生存的各个向度上享有一些共同性。讲好中国故事可以进行文化融合,但是需要开放的叙述者视野——建立在不断探究基础上的同理心,将文化他者视为可以理解的对象,理

解倾听他者的言说,并做出真诚审慎的判断。如永见勇所言,“如果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理解受到历史的限定,因此允许我们自己向外团体的所说敞开,那么我们之间就可能形成一个新的视域。”^②任何中国故事的讲述者都会受到历史的限定,能够倾听,理解讲述对象生活的一般形式,且以同理心去表现讲述者和被讲述者的这种差异,作出合理的判断,而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才是获得认同的关键。

四、结语:非虚构文学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方式

“中国”是什么样的,是通过被言说、建构而被认识的,言说所及的中国人、事和空间都是有意识的选择,其背后有相应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撑。将中国植入故事中去言说是展现中国的有效方式。海斯勒的非虚构小说,讲出了国际读者喜欢看的中国故事,也刷新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由此参与了中国国际形象的建构,有效扩展了中英文读者的共同意义空间,可以说为共识的达成做了准备,“频繁、反复的传播会使人们对某些事物的观念趋同,在不涉及重大利益问题时尤其如此。广泛、深入的交流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分歧”^③。非虚构小说这种文学实践属于大众传播,讲述的中国故事兼具纪实性和文学性,传播涉及的面很广,大量频繁的传播会使人们对中国的观念趋同。并且,鉴于安德森的考察,小说是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手段,小说的结构展示的诸多互不相识的行为者,组成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穿过时钟和日历规定的同质时间的想法,恰好成为了民族理念的准确类

比。^④而非虚构小说因为具备纪实体裁的规约,有较多的确定性信息,更成为再现中国的直接方式。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忽视非虚构小说这一维度。海斯勒的小说提供给我们一个能够频繁传播让读者认同的样本,能够为探索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一些启示。

从传播主体的角度看,身为美国人的海斯勒,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必然会携有西方人的文化认知框架,这是国外传播主体在讲述中国故事时的先天因素。这一因素会使其在选择针对英语世界读者的中国题材时,更容易挑选共通性的话题,从而为中国故事的传播找寻一个言说社群。其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能自动与自身文化传统对接,讲述一些本国读者不太熟悉的事情,从而在内容上构成对本国读者的认知差,在视角上构成对被讲述国读者的认知差。这是身为他国文化中的传播主体讲述中国故事时所具备的一大优势,因此讲述中国故事,可以考虑征用更多的他者文化中的传播主体,尤其是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以便跨越文化障碍。

从传播内容上看,讲述具有典型性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展现丰富多元的中国,比对中国进行宏大叙事更易产生接受认同。讲述时,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技巧,让读者贴近作者、浸入式贴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会使中国故事的讲述带有更多的代入感和可接近性。不过,第一人称叙述,要使意义生成朝向积极认同的方向发展,则需要讲述者采用探究的方法谨慎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本着同理心去讲述。任何判断的得出,都需要建立在仔细考察、并且尊重读者差异的基础上,讲述者的态度是否真诚宽厚会直接影响到国际传播的效果。

注释:

- ① 曹茹、郭小旭《从接受美学看媒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隐喻、母题与适度陌生化》,《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10期,第28页。
- ② 本图借鉴了张汉良先生的“表意过程与意义传递过程”图(载于《文学的边界》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并用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进行了对应。
- ③ 周宪《认同建构的宽容原则和差异逻辑》,载《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0页。
- ④ 刑军纪《试论当代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可能性》,《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60页。
- ⑤ 张吉人《与〈寻路中国〉有关的几个段子》,《编辑学刊》2011年第7期,第60页。
- ⑥ 《甲骨文》因为没有简体中文版,因此总评价数还不到4000,比其它两本书少了很多,评论数也大大减少。
- ⑦ Aron.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94053.River_Town?#other_reviews. 2011-08-28.
- ⑧ Goran.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9755.Oracle_Bones#other_reviews. 2018-11-03.
- ⑨ Adina.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6945572-country-driving#other_reviews. 2017-01-22.
- ⑩ VLAD KOVSKY.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6945572-country-driving#other_reviews. 2021-07-13.
- ⑪ Nick Grammos.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6945572-country-driving#other_reviews. 2021-01-25.
- ⑫⑬ [美]彼得·海斯勒《江城》,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中文本序,第6、443页。
- ⑭⑮ [美]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259页。
- ⑯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页。
- ⑰ 詹姆斯·雅各布·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赵星植译,载《皮尔斯:论符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 ⑱ 杨向荣《陌生化》,《外国文学》2015年第1期,第63页。
- ⑲ Susan Lanser. *The Narrative Act: 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60.
- ⑳ Ensiform.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94053.River_Town?from_search=true. 2013-05-30.
- ㉑ Ensiform.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6945572-country-driving#other_reviews. 2012-02-16.
- ㉒ Rachel.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94053.River_Town?#other_reviews. 2012-06-07.
- ㉓ 木须龙.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7060185/comments/>. 2012年5月8日。
- ㉔ 永见勇《文化鸿沟:我们为何会误解?》,载[美]罗伯特·C. 所罗门《哲学导论》(第9版),陈高华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38页。
- ㉕ 赵建国《论共识传播》,《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第38页。
- ㉖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叟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4页。

(作者王小英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明蔚系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和艺术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俊】